

论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

■ 匡存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代表学者科西克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深度融合,深入捷克社会主义政治、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判,提出了“结构辩证法”“辩证意义批评”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范式,彰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多元开放、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特色,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科西克;辩证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1)09-002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19YJC752013)

匡存玖,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四川雅安 625014)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的最重要代表,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于20世纪50、6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自然科学等融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研究范式。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其一,基于捷克斯洛伐克“开放、综合”的理论批评传统及现实语境,将存在主义意义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批判方法融合在一起,开启了一种“结构-意义”的综合分析模式,与阿尔都塞“理论反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沙夫“反结构主义”的人道主义语义学批判形成鲜明对比。其二,借鉴融合了法国结构主义的静态分析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布拉格结构功能学派的“动态分析”模式,建构了一种“辩证、动态”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判范式,兼具两种分析方法的长处。其三,提出了“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指向,深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异化”的现实政治、日常生活等领域展开批判,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改革和“布拉格之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前,国内学界较少从符号学角度考察科西克的理论思想,本文试图对科西克的符号学美学思想进行集中探讨,从理论与现实层面考察其“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批判基础、核心论题及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基础

马勒克·阿达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结构主义概念涵盖人对世界获取的理论及实践过程，因此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这种意识动机可使人在人类解放道路走得更远。”^{[1]1043}20世纪50、60年代，科西克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批判，既大量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批评、存在主义意义阐释批评和自然科学等理论基础，又将其符号学美学批评植根于捷克斯洛伐克“开放、综合”的深厚历史与文化传统当中，奠定了“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批判基础。

自19世纪末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了强大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传统，深刻影响了科西克的符号学美学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美学家与音乐史家霍斯廷斯基提出了“具体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主张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等角度考察艺术的历史与现实起源问题，对20世纪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科西克的“具体总体性”研究产生了影响。而在20世纪的前20年，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夏尔达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系密切，他积极将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与社会学、心理学原则融合，开创了“科学评论”，奠定了捷克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到20世纪20至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先锋主义的“诗歌主义”主张，以及布拉格功能学派，特别是穆卡洛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美学传统，对20世纪50、60年代科西克、沃迪奇卡、卡里沃达、奥苏斯、祖姆等学者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登柯·斯卡洛夫斯基指出：“科西克批判地吸收了通过现代科学、结构主义以及包括‘作为可能是最好的系统的资本主义’在内的大系统理论所获得的知识。”^[2]概括而言，科西克吸收的知识包括：

其一，结构主义。包括穆卡洛夫斯基、戈德曼等人的思想。穆卡洛夫斯基不仅把系统、发展和变化的结构观、时空观、等级观运用于文学美学研究，而且拓展到了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域，直接影响到科西克辩证与动态结构发展观的形成。此外，穆卡洛夫斯基在结构功能美学中纳入胡塞尔“意向性”理论所建构的艺术意向性与非意向性理论，也拓展了科西克“现象学”式的实践符号学批判视野。戈德曼积极利用“主体心理学”或“发生心理学”改造结构主义所做的系列努力，提出了“有意义的结构”“辩证的具体的总体性”“超个人主体”“同构”等系列概念。科西克的“具体总体观”及“现象学”式的结构主义阐释范式等都与之有类似之处。卢博米尔·索霍尔认为：“与卢卡奇不同，在L.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科西克把具体的总体性解释为一种等级结构。”^{[3]1485}

其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本身就蕴含了丰富语言符号学资源，也为科西克的符号学美学研究提供了资源。20世纪以来，由于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集中关注人类心灵的内在结构及其思想特性剖析，而结构主义主要关注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外在结构的客观分析，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相反相成性和互补性，使得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建构了某种特殊关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在“语言学转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江怡指出：“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带来了整个现象学运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即语言的对象表达和意义是意识活动的重要显现。”^[4]这种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著名命题。作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科西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他们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语言观，在具体总体性美学中注重将艺术、诗和语言纳入世界辩证统一体中审

视。另外,科西克的导师帕托奇卡基于胡塞尔后期思想展开生活世界问题及结构和人的地位的问题研究,也对科西克的结构主义政治研究和存在主义意义分析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现代科学。科西克对自然科学包括数学论、系统论、控制论等都极为熟悉。众所周知,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结合,是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理论传统。科西克显然也受到苏联符号学的影响,他把自然语言称为一种“数学的语言”,强调如果不掌握好几何图形和数学符号的语言,就无法科学地解释自然,当然也不能从实践上更好地把控自然了。张一兵认为,科西克哲学美学涉及的“控制论重新提出了人是什么问题”,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系统观批判,也体现出一种“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观点”。^[5]因此可以说,科西克也自觉将自然科学纳入其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批判视野。

此外,20世纪以来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形成的“开放、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也为科西克建构其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提供了良好基础。20世纪上半叶,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政治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等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在捷克斯洛伐克碰撞,先后涌现出了“社会主义先锋主义”“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功能美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思潮。20世纪20、30年代,卡莱尔·泰格率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将马克思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研究。另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瓦茨拉维克,也主张融合历史形式批评建设一种“综合、包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观点都受到科西克的赞同。“开放、综合”研究态度甚至影响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整个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两股色彩迥异的理论思潮在捷克斯洛伐克学界碰撞融合,使得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一种是以科西克为代表的“存在人类学派”,积极将结构主义、语言学 and 符号学、存在主义等理论资源融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现代思潮关系密切;另一种是与以里赫塔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革命美学,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并借鉴苏联洛特曼的结构主义研究路线,对社会现实结构及其文艺意识形态进行理论阐释。当然,这两种研究倾向无法截然分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就科西克而言,他既接受过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官方马克思主义训练,也受卢卡奇、萨特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既吸收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人文思想,也大量纳入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自然科学等理论元素,使其哲学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开放性和独特性。

综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自然科学”构成了科西克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四大”理论基础。在捷克斯洛伐克“开放、综合”的历史语境中,科西克基于马克思主义将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自然科学纳入其批判视野,既继承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先锋派”传统;又借鉴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符号学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注入了丰富的符号学批判元素。

二、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核心论题

(一)“结构辩证法”批判

“结构辩证法”是科西克在考察社会实在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他看来,社会实在的一切领域都是“人类存在的结构”或辩证统一体,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接视为辩证的结构主义方法,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艺与美学问题研究要注意形式结构分析与功能系统分析、静态考察与动态分

析的辩证统一。这无疑彰显出科西克符号学美学研究鲜明的辩证性、结构性等分析特征。

科西克深刻洞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后蕴含的符号学思维。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试图创造一种统一的新科学，是因为人们发现实在的结构本身是辩证的。”^{[6](P25)}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正是一门关于社会实在结构研究的学问，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特征。比如，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分割原一”理念与结构主义在“二元区分”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分割原一”就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叙事方法，而马克思、卢卡奇、科西克关于“主客体、人和自然界、自然和必然、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等概念分析，也体现出二元结构叙事的特征。尽管科西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知看上去有误读的嫌疑，但不得不承认，他对结构辩证法的认识是深刻的。

按照科西克的说法，提出结构辩证法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辩证发展规律或真理性认识。他注意到，一般结构主义只关注结构内容、属性、过程等普遍性描述，而较少关注结构背后运行的规律及真理。因此，他认为结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结构主义的认知范畴。同时，科西克还希望通过结构辩证法克服现代西方思潮走向极端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弊病。在他看来，20世纪形式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把全部社会实在都还原成了机械、物理或化学的存在，片面化地割裂整体与部分、人和自然界、自然和必然、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已经滑向了唯心主义的边缘。另外，20世纪50、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过度意识形态化问题，诸如忽视艺术发展规律，单纯地用政治批评取代艺术批评，走向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针对这些问题，科西克希望用结构辩证法来批判和抵制这些不良倾向，用辩证的方法论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揭示出隐藏的辩证规律及其真理性认识，弥合整体与部分、总体与具体、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裂痕。

基于这些认知，科西克把结构辩证法视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他看来，全部社会实在都被视为一种“人类存在的结构”，并被延伸到了社会实践批判的各个领域。在他那里，“实践”和“结构”就是一对“同义词”，社会实践、社会历史、艺术和人，都是由彼此对立的力量或元素建构而成的辩证统一体。比如，艺术所展现的现实被科西克视为人与世界存在的结构，并纳入社会实在的辩证统一体中，来审视其命题、乐曲、语言、观念等结构性要素。作为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同样也被科西克视为一种可以发挥重要社会实践功能的结构化成分，并被置于社会实在结构的核心地位，具有源于社会结构而又超越社会结构的作用。基于这种结构化的社会实践分析，科西克强调，只有通过结构化的实践批判才能真正地把握现实与自我，因为现实世界对物的结构把握只能通过特定的实践活动进行，而无法通过沉思、反映等其他方式进行把握，所以通过结构认识实践也就理所当然了。

科西克对作为社会实在结构的“具体总体性”展开了全面分析。在他看来，“具体总体性”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6](P28)}，而现代性则体现为“一种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永恒性与暂时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矛盾运动的过程”^{[7](P36)}。可以看出，科西克的“具体总体性”概念明显源于卢卡奇“总体性”概念，而“总体性”在卢卡奇那里是一种典型的形式符号概念，被普遍用于物化形式、现实主义形式和艺术形式的批判当中。如果说卢卡奇的批判还处于一种静态形式分析的话，那么，科西克突出用动态与辩证的发展观诠释“具体总体性”，实现了对静态分析法的超越：他既看到了作为社会实在的具体总体性的整体性特征，更看到了作为“生物有机体”发展的功能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特征。在科西克那里，社会实在不只是由某些部分、事实或因素排列而成的整体，而是由现实生活中相互关联和作用的系统功能体建构而成，并且一

直处在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再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矛盾、从矛盾到总体的“具体化”演进当中。而且,科西克还注意将穆卡洛夫斯基的动态结构功能观拓展到了社会实践批判上,极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例如,艺术创作及其实践,就呈现出主体和客体交互生成、互相建构的结构化过程。而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主客体能动积极地参与创造,艺术既描绘实在也构造实在,既是一种反映又是一种投射,既发现事实也积极做出预测和规划,呈现出系统功能体的辩证发展特征。

此外,科西克的结构辩证法批判,也集中体现在他对非辩证“虚假总体”的批判上。在他看来,由于虚假总体过度强调结构的片面发展,忽视辩证发展,从而导致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主观与客观等关系的割裂。这种批判的灵感事实上源自于卢卡奇对异化形式的批判,科西克的创造性贡献在于,通过“空洞总体”“抽象总体”“恶总体”这三种非辩证“虚假总体”的批判,让我们对异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例如,“空洞总体”过于强调总体性或抽象原则,拒绝对现实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反思,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忽视了现实生活意义的丰富性、个体的多样性,从而变成了一种缺乏洞察力、反思力的虚假存在。“抽象总体”则将整体形式化并凌驾于事实之上,取消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互动、相互联系及作用,从而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虚假存在。而“恶总体”又将神话化、物化或拜物教化了的恶主体替代真正主体的人,将具体的人排除在总体性之外,导致了主体与客观之间的割裂,变成了一种任由结构自主运行和无意识控制的虚假存在。可以说,这些都不是辩证的结构统一体,只有具体和总体的融合才是真正的辩证结构统一体。

(二)辩证意义批评

辩证意义批评是科西克基于存在主义意义阐释建构的一个重要符号学命题。他将存在主义对个体自由、存在意义的本真性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性解放相结合,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生活、艺术文本中涉及的“捷克问题”和人的真理问题展开了全面解读,彰显出辩证的语义化或意义批评特征。

辩证意义批评首先体现在科西克对异化世界所产生的“意义操持”的批判上。在他看来,“异化”作为对人和世界所造成的意义操持,即是对人与世界的控制。“意义操持”产生了一个异化了的“意义世界”。在他眼里,现代性危机正是源于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普遍操控和意义的异化,技术理性将“实在组织为一个将被征服、被估量、被处置和被超越的客体。甚至连同人、事物、自然、观念、感受性也成为普遍的可操控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8](106)}。在这里,科西克有意运用存在主义的意义阐释纠偏结构主义,批判受结构控制的异化形式。他不仅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冷冰冰的技术理性逻辑统治下,人及其活动被剥夺、被操控,而且批判异化了的社会对人的主体及真理、善恶辨识能力的消解和压制。正是在这种异化了的社会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消失了,要么被神化了的主体取代,要么被结构化了的自主运动所取代。人也就丧失了基本的辨别能力及其需要,包括真理、是非、善恶等辨别能力。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真假善恶混杂一起,冷漠统治世界,真理混同于虚假,善良混同于邪恶,高贵混同于卑微。

这种意义操持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更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科西克深刻意识到日常生活意义操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意义操持”年复一年存在,所到之处,将一切都转化为一种单调、乏味、枯燥和功利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事物沟通时官能感觉上的“烦”。在这个过程中,事物失去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价值。日常生活中的操持既把人转化为一种操控者,同时也转化为一种操控的对象,而这种操控与被操控又被另一种更大的操控系统所操控,使一切事物都变成无意义的存在。

为了寻找“失去”的意义,科西克借助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对艺术、文本作了大量的意义阐释。

他主张从历史与社会视角找寻意义,在他看来,文本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关于它的解释史。文本是解释的出发点,文本的生命就在于给它赋予意义。文本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文本的历史是多种不同解释的历史。由于每个时代都会对文本进行解释,但所强调的文本意义和价值并不相同,因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所关注的内容和方面也不同。同时,他还强调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的阐释。文本阐释是对社会事实进行解码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排除虚假总体,去伪存真,真实呈现具体总体性或真实的社会实在。但解码过程往往又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认识过程,因此必须采取辩证意义批评的方式。为此,科西克强调要把文本纳入社会实在分析当中,认为只有纳入社会实在分析,才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性分析,否则就会变成抽象的框架分析。而文本阐释也应纳入意义的结构分析,只有把作品作为意义结构展开分析,意义阐释才会成为一种辩证的意义结构分析,否则仍会异化为一种虚假总体。

同样,科西克借助存在主义意义阐释对艺术文本和“真理”问题展开了追寻。在他眼里,一件艺术品的生命史就是它的解释史,每个时代都会赋予它不同的时代意义,从而增加它的社会内涵与时代价值。科西克关注艺术的意义生成过程,强调艺术品的生命在于给它赋予丰富的意义。艺术品生命力的持久性,就在于它与欣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不断赋予艺术以新的意义,才能使其长久充满生机与活力;只有持续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才能说明艺术保持着长久的感染力和生命活力。可以说,科西克从动态、辩证的视角审视了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为艺术文本的意义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他对艺术真理的追寻也富于启发意义。他主张,艺术对现实的把握就是为了揭示真理,真正的艺术都是非神秘化和革命性的,它们揭示历史真理,破除各种幻象,让人远离实在的偏见,从而进入实在本身和实在真理当中。在他看来,尽管没有艺术,真理也可能被人们知晓,但艺术会通过隐喻的方式重复这些真理与观念,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在被结构化的系统操控下窥破真理,使人们在参与事件过程中成其为真正的社会实践变革者和创造者。

综上,科西克通过结构辩证法和辩证意义批评,揭示了社会实在作为一种“具体总体性”结构的整体性、功能性和系统性特征,批判了非辩证的“虚假总体”,对现实世界“异化”、意义操持、艺术真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彰显出科西克结构符号美学批判的辩证性、多元性与独特性。

三、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的理论贡献

尽管科西克较多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思想理论存在来源多元、乌托邦等方面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在理论批判时所体现的宽广视野与领域,“动态、辩证和开放”的批评态度和方法,以及高度重视社会实践与人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倾向,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第一,科西克继穆卡洛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美学之后,开启了“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判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批判视野,增强了话语活力。如果说穆卡洛夫斯基在20世纪30、40年代采取的是一种从“形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线,那么科西克则恰恰相反,他最早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则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融合批判路线。也就是说,科西克从根本上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批判的初衷在于通过引入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观念,拓展其理论批判视野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在《捷克激进民主》《具体辩证法》《现代性的危机》等系列著作中,科西克不仅将穆卡洛夫

斯基局限于文学和美学等领域的结构功能美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社会政治、艺术、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还将卢卡奇局限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物化”“总体性”批判的形式符号美学,拓展到了捷克社会主义官僚政治、文化生活等领域,并上升到文化与现代性批判层面。可以说,科西克的理论批判范式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例如,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研究,就是受科西克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波兰著名文化学者鲍曼提出了“作为实践的文化”命题,把文化视为人类经验的构建、现实和理想的调节、知识和利益的融合^[9],也是深受科西克影响。

第二,科西克的“开放、辩证、动态”的理论批评态度和方法,对于提升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阐释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启示。20世纪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特色就在于采取了一种“开放、包容、辩证”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态度。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思潮频繁在捷克斯洛伐克碰撞融合,不仅有批判论争,更有创新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阐释力和话语地位。科西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之所以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就在于他秉承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广泛吸纳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科西克所采取的动态考察与静态分析、结构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法,不仅对于批判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心理主义等思潮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倾向,以及捷克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倾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阐释力和影响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和借鉴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辩证地对待和使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借鉴它们的优点与长处,不断丰富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语阐释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指向社会主义实践与人道主义批判,彰显出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美学鲜明的实践批判色彩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精神。20世纪50、60年代,科西克和卡里沃达、斯维塔克、马霍维茨等知识分子一起,积极参加“布拉格之春”前夕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良运动,致力于通过人的“真理”及“捷克问题”研究,使人脱离结构系统的操控并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实现社会主义同个人自由的辩证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如何使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问题与人道和民族的存在相协调呢?我们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追求政治权利的完整和平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否则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10](P100)}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人的解放,人应当成为自己世界的造物主和创造物,而不是把人单纯地理解为某种客观事件的反映。他既从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学等层面关注人和人的存在,把人视为一切哲学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核心及其关键;又从现实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介入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对“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发展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凯文·安德森将其纳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视野审视,认为科西克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一种新的意义”^[11]。可以说,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再将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人文主义看成是完全对立的思潮,而是将它们视为不同的方法论,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目的。另外,其存在主义的批判也不再局限于个体自由、意义的追寻,而是与社会主义的总体解放和意义追寻结合在一起,是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融合。正因为如此,1963年弗洛姆把科西克纳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注视野,对其辩证的结构批评及意义批评给予了高度肯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科西克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自然科学等多元思想有机整合到了社会实践批判之中,开启了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批判范式,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深受捷克斯洛伐克“开放、综合”的历史与文化阐释传统的影响;同时受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穆卡洛夫斯基结构功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阐释传统。另外,他还受到卢卡奇的形式符号美学、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以及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语言学符号学批判的影响。科西克不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在符号学方法论上的相通性、一致性,而且将社会实在解放为一种“具体总体性”的结构,他深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历史、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展开“捷克问题”批判,揭示“异化”对人的自由、意义、真理的操持,并展开“文本”的历史解释,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总体解放的统一。通过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科西克走向了社会实践批判,也走向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文化现代性的理论批判之路。

[参考文献]

- [1]Adam,Marek. Karel Kosík v kontextu marxistického myšlení (osobnost a rozbor díla), České? Budějovice: Disertační práce Jihočeské univerzity v České republice,2010.
- [2](马其顿)登柯·斯卡洛夫斯基.科西克具体总体的辩证法[J].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12).
- [3](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M].郭明忠,张小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4]江怡.语言解释和心灵的结构——英美与大陆语言哲学比较研究初探[J].辽宁大学学报,1989,(4).
- [5]张一兵.科西克的具体总体观探析[J].唯实,2000,(7).
- [6](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 [7]李宝文.具体辩证法与现代性批判:科西克哲学思想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8](捷克)卡莱尔·科西克.现代性的危机——来自1968时代的评论与观察[M].管小其,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9]傅其林.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命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 [10]郭翠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岁月[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 [11](美)凯文·B.安德森.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J].张蕴艳,译.探索与争鸣,2013,(8).

【责任编辑:陈德明】